

都派出自己的特派记者。因为其间有诸如语言不通、经费不足、人力缺乏、拒绝采访等诸多因素。

王峻涛说：即使不为《北京晚报》做报道员，他同样每天要以“新闻眼光来看会”，因为如果一天听会下来，糊里糊涂就过去，而没有像新闻记者那样敏感和主动的捕捉、分析信息，这会等于白开了。

我们身边这样的传播者越来越多，报道员的出现实际是个体传播时代对媒体换位意识的一个“举例”。

对于整合传播这个以事件参与者为传播发起者的传播行为，无法用传播学词汇来描述，但基本应符合一个条件：让最有资格说话的人直接说话。比如“《财富》论坛”上最具传播资格的其实不是记者，他们只能在场外捕捉花边新闻，或者二手新闻，最具传播资格的恰恰是听会者。首先，他们不是主持者、组织者，不需要考虑会议的正反面效果；其次，他们和记者一样，对会议的内容感兴趣；第三，他们都参与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的讨论，掌握了足够多的背景资料。其他人包括媒体都要给这个“最有资格传播”的人打下手。

整合传播需要换位意识

一、从本地化意识到全球化意识

在清华园里曾经举办过一次国际传播研讨会，来自美国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的冲击首先作用于传播上，它使全球化的信息可以实现瞬间传递。任何一家媒体，不论在物理意义上位于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在信息空间里都将被推到全球化的一个点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全球信息，传播全球信息。在这种传播中，过去一个媒体控制一个地区、领域新闻的情况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媒体如何整合进全球信息，整合传播将越来越多。

二、从采访意识到传播意识

善于利用现代传播工具，将不只是媒体中个体的任务，而且是媒体作为整体必须学会的本领。简单地说，媒体内部和外部要创造出完整的建立在新式技术基础上的传播体系，媒体工作者应主动把自己定位于传播者，而不是采访者。这一点，广电系统已经开始局部尝试，如制播分离；但如果我们更大范围地推广这一作法时会发现，经过传播控制，某些特定场合下，非专业人士完全可能成为节目“制作”者，而媒体的作用是为他们服务、把关。

三、从通讯员意识到报道员意识

媒体要加强与具有生活引导能力、潮流分析能力的人群的沟通和联系。通讯员更多的是单位里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他们实际是记者的影子和补充。现在，新式报道员应该是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单位里最具发言权的人，他们往往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个企业的领导者，这个行业的带头人。一个报道员首先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观察家，其次是一个善于用细节说话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乐于为公众传播新观念、新知识、新闻事件的人。要让这样的社会精英成为媒体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让社会精英直接在媒体上发言，为媒体的受众服务。这时，记者是报道员的补充。

当然，以报道员为发起者的传播方式只是以记者为主体的传播方式的一种补充。（压题照片为香港外景）●

本栏编辑 周燕群(zhou@xinhuanet.com)

难忘的中东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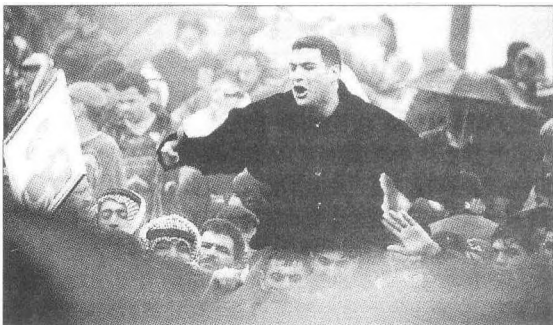
□ 姚大伟

1997年底，我来到开罗，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摄影记者。在驻外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跑了不少地方，经历了不少事情，也长了不少见识。

调研是报道的基础

调研，对一个记者来说，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一个驻外摄影记者尤其重要。要做一个专家型的驻外摄影记者，必须对自己所管辖地区和报道领域的各类问题进行认真调研，做好各方面背景知识的充分准备；此外，还应对外界或地区的形势发展趋势以及重大事件演化方向作出正确的判断。没有坚持不懈的调研，便没有记者的透视力和预见性。

初到开罗，正值埃及南方古城卢克索发生伊斯兰极端分子枪杀 58 名外国游客的血腥恐怖事件后不久，埃及一时间被恐怖主义的阴影所笼罩，旅游业一落千丈，陷入低谷。金字塔前门庭冷落，尼罗河畔舟浆自横——埃及已成了令外国游客望而却步的“禁地”。埃及政府正增加大批警力，防止恐怖袭击事件再度发生。通过调研，我了解到，埃及是个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已在埃及作乱 20 多年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体”的奋斗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来推翻埃及世俗政府，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而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与侨汇、石油出口和苏伊士运河过境费并列为埃及四大经济命脉。恐怖组织屡屡向旅游业发难，以期达到颠覆政府的目的。我立即着手拍摄了两组专题《埃及旅游业因恐怖活动陷入低谷》和《埃及增加警力防止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来，这两组照片均被评



□1999年2月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安曼病逝。图为冒雨守候在医院外的青年听到消息后放声痛哭。

为好稿。

1999年5月12日,我赶往耶路撒冷,报道提前举行的以色列大选。我根据平时的调研了解到,1996年上台执政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所推行的强硬路线已遭到越来越多以色列民众的反对。以色列经济发展也因中东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前而严重滑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民众对此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提前举行大选的议案。赶到耶路撒冷后,我立即着手了解情况,研究形势。这次大选共有5名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在大选接近尾声的两天里,3位候选人相继宣布退出大选,只剩下巴拉克和内塔尼亚胡,形势对巴拉克极为有利。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后,我认定,如不出意外,巴拉克必胜无疑。大选当天,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投票,但我还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舍近求远,从耶路撒冷赶往特拉维夫附近巴拉克的家乡,拍摄他投票的照片。大选结果是巴拉克以绝对优势击败内塔尼亚胡,当选以色列总理。

随时处于临战状态

与国内采访一样,驻外摄影记者应该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保持高度的敏感,及时把握动向。日常要留心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与当地政府新闻部门建立联系,与同行沟通信息,建立起自己的严密而灵敏的新闻信息网;同时要注意观察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前兆,增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预见性,以便快速反应;另外还要随时处于临战状态,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设法尽快到达现场。

1999年2月4日,身患淋巴瘤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在美国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失败后,决定立即回国,和他深爱的国民一起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我很快拟好了采访申请报告并发往总社。兵贵神速。在报告被批下来后,我当天便飞往约旦首都安曼。到达安曼后,我在分社首席记者朱少华的帮助下,连夜赶往医疗中心外拍摄为国王康复通宵祈祷的民众。第二天,我又冒雨守候在医疗中心门外。接近中午时,医院的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了人们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国王病逝。现场顿时大乱,人们悲痛欲绝。第三天,我前往勒盖达王宫,拍摄隆重的国王葬礼。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晚走一天,我可能什么也拍不到了。

1998年11月5日,耶路撒冷市中心发生汽车爆炸案。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现场。这时,军警刚开始疏散群众,设置警界线。当便衣警察发现,将我赶出场外时,我已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而大批记者才陆续涌来,可惜他

们晚了一步,被军警结结实实地挡在圈外。

“因为你也是为了工作”

摄影记者在快速反应、到达事件现场后,经常会受到诸多限制。比如,没有拿到有效证件,没有得到拍摄采访许可,被保安人员挡在门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获得机会,拍摄到理想的照片,是对每个摄影记者素质的严峻考验。有些采访机会看来希望渺茫,近乎绝望,容易让人放弃。在这个时候,只要你多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大胆去试一试,闯一闯,或许奇迹就会出现。

1998年12月13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访问巴勒斯坦。我和分社文字记者谭新木提前一天驱车赶到加沙边境的巴勒斯坦新闻部临时接待站领取采访证件,结果却大失所望。巴方新闻官只同意给我们一个采访证,而且只能采访克林顿在巴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讲一场活动。我们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无济于事。克林顿的专机将要降落在刚刚开放的加沙国际机场,阿拉法特将在那里举行欢迎仪式,这也是一场重头戏。我最后决定拿着那张采访克林顿演讲的证件去闯一闯。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加沙机场。这时距克林顿到来只有



□1998年12月18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巴勒斯坦青年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图为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逃离冲突现场,远处一位以色列士兵正在向他瞄准。

15分钟了,机场大门已经关上,门外站满警察。一个便衣警察对我做着结束的手势,并连声说“哈拉斯”(阿拉伯语“结束”的意思)。我则举起相机和那张记者证向他叫嚷。眼看克林顿的直升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他让身边的一个警察带我走。走了不到50米,我拐进了一个侧门,一个警察头目迎上前来,打开我的摄影包看了看,摆手便放我进去。我心中暗喜,想不到竟如此简单便混了进来。这时,克林顿的直升机正在降落,我撒腿便跑,一直跑到了最靠近

直升机的记者堆里。就这样,一个没有采访证件、又来得最晚的摄影记者,却站到了最好的拍摄位置上。结果,那天拍到的阿拉法特夫妇陪同克林顿夫妇检阅仪仗队的照片,让我非常满意。当我拍完照片时,那位新闻官看见了我,先是满脸疑惑,后又厉声问我怎么进到这里,我轻声告诉他:“我已得到了你们最高长官的许可。”他看了看我,也搞不清我究竟什么来头,就不再说什么了。

1999年11月18日至19日,本世纪最后一次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54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会议,吸引了世界各新闻媒体的大批记者前来采访。当我提前赶到大会新闻中心办完记者证后得知,这次大会的各项重要活动,包

括开幕式和闭幕式都需要持有 POOL 证（在重大采访中，根据国际惯例，由主办单位指定或记者协商推荐出的享有特殊采访权的记者的证件），才能到现场采访，而报名采访的所有中国记者没有拿到一张 POOL 证。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小刘找到大会新闻官，尽管我们费尽口舌，对方也只答应给我们在大会开幕前采访另外一场活动的 POOL 证。当我去领取那张 POOL 证时发现，这次大会各场重要活动的 POOL 证颜色、尺寸都是一个规格，只是上面的字不一样，心里便又打起了主意。第二天上午是此次会议的开幕式，我早早地跑去排队，和持有开幕式 POOL 证的外国记者一起坐上从新闻中心开往会议中心的班车。在车上我被一个新闻官发现了，我就告诉他我只是搭车到会议中心大门口去拍些照片。等到了大门口，我便把昨天的那张 POOL 证挂在胸前，夹在一大帮记者中间往里走。大概因为我们是新闻官带来的一车记者，每人脖子上又挂着黄色的 POOL 证，门口的保安并未逐个细看，但中央电视台的小刘因胸前什么 POOL 证也没有，还是被保安发现，挡在了门外，我则趁机混过了第一道关卡。怀里像揣着只兔子，我小心翼翼地跟着队伍走，背后听见小刘透过围墙栅栏羡慕地冲着我高喊：“你小子真行。”随后，我又顺利通过了第二道关卡。但就在我快要走到会议厅门口边上的记者区时，刚才车上的那个新闻官又发现了我，我马上走过去，低声说：“我是唯一一进到这里的中国记者，我没有 POOL 证，但又要完成采访任务，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多关照。另外，现在如果你把我交给保安赶出去，你也可能会因为已经把我带到这里而招来麻烦。”他大概觉得我说得有道理，用手指了指记者区，小声说道：“小心点，别给我惹麻烦。”不一会，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出现在门口，开始迎接陆续入场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我不停地按下快门，那感觉真是好极了。事后，我又找到那位新闻官，向他表示歉意和感谢，他却认真地对我说：“我会原谅你，因为你也是为了工作。”

“你们是离阵地最近的记者”

摄影记者每次采访都必须亲临现场，有时会直面凶险，这就要求他必须有强烈的职业使命感、荣誉感，敢于迎接一次次危险的挑战。但我们也坚决反对赤膊上阵的匹夫之勇，因为生命珍贵，应该胜过每一张照片。

1998 年 5 月 1 日，利比亚政府邀请常驻开罗的一批外国记者乘坐专机前往中部非洲国家乍得，参加由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召集的大型祷告会。卡扎菲演讲完后，钻进了防弹越野吉普车，并从天窗里探出身，向热情的人群挥手致意。群情激昂的人们高呼着支持卡扎菲的口号。顿时，全场大乱。卡扎菲赶紧把身子缩回车里，20 多位保镖把车死死围住，不让人群靠近半步。宽大、笨重的越野吉普车一步一步地往前移，终于冲出重围，但骚乱的人群并未因卡扎菲的离去停息下来，10 万多人的祷告会现场完全失控。突然，远处传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有十多万
人参加的乍得祷告会发生骚乱。祷告会
召集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车顶中间
戴白头巾者）在保镖的奋力护卫下仓皇
撤离。

沉闷的枪声，隐约可见几辆军车急速冲进场内，荷枪实弹的黑人士兵鸣枪示警。我站在一个离地 4 米多高、用脚手架搭起的放置音箱的小平台上忙着拍照，枪声一响，这个制高点很容易被击中。来不及多想，我赶紧爬了下来。“快撤，快撤！”利比亚新闻官朝我怒吼。找到出口，跑出场外，我跳上一辆正在发动的破车匆匆离去。身后的枪声越来越密，夕阳中，远远看见那个音箱平台已被挤倒——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光着脚的，先前因为要到祈祷毯上拍照而脱在旁边的皮鞋已无法找了，只好一路赤脚回到开罗。后来，利比亚方面特意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虽不太合脚，却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1998 年 12 月 18 日，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巴勒斯坦青年与以色列士兵发生了激烈冲突。当我们把车开到冲突现场，就看见几百名巴勒斯坦青年示威者，躲在马路两旁的房屋后面，向三十多米外的以色列士兵扔石头。有人还把废弃的旧轮胎扔到马路上，猫着腰跑过去点火。以色列士兵则在交界处的马路当中以几辆军用吉普车为屏障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我端起相机，一步一步往前凑。一个用围巾蒙住小半个脸的巴勒斯坦小青年弓着腰在马路中间点着轮胎，然后匆忙逃离。远处一位以军士兵正在举枪向他瞄准，我立即按下了快门，这时我们正好成三点一线位置。我的耳边不时响着橡皮子弹的嗖嗖声，一颗子弹落到脚边不远处的地方，满地打滚。要想拍到好照片，就要靠近被摄物，但越靠近也越危险。当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边拍边往前走，后来一转身，我吓了一大跳，几个巴勒斯坦小青年正躲在我身后向以军士兵扔石头，不知不觉我已成了他们的人体盾牌。

1999 年 12 月 24 日，我和新华社黎巴嫩分社阿文记者王波前往黎以边境前线采访，路上认识的一位真主党游击队队员主动提出给我们带路。当我们的出租车开到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的中立区时，他示意我们“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前走了。为了拍到以军在对面山头的岗哨，我提出要越过中立区。当我们全然不顾身后墙上的累累弹痕，迎着以军的据点一步一步往前走时，这位曾经参加过 100 多次袭击以军阵地的游击队员说：“你们是我见过的离以军阵地最近的记者。”●

（文内插图照片均为姚大伟所摄）

本栏编辑 周凤桥 (zhoufengqiao@xinhuanet.com)